

安阳王古道村周代贵族墓四题

井中伟 和菲菲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关键词: 安阳王古道村, 周代, 低级贵族墓, 丧葬礼器

摘要: 2004年8~9月, 考古人员在安阳市王古道村发掘出两座保存完好的周代贵族墓葬。研究表明, 它们的下葬年代很可能在西周末或春秋初年, 墓主应是卫国的“士”级贵族, 其中M2为男性, M1为女性, 二者是夫妻异穴合葬墓。发掘者对三类器物的定名有误, 其中M1出土的圭形铜片应该定名为“鬯”, 是一种用于遮障棺柩、标志贵族身份的礼仪丧葬器物。此外, M1出土的以铜鱼为核心的饰棺用器, 其长方形的平面形状可能代表了古文献所谓“士一池”的社会等级。

KEY WORDS: Wanggudao village in Anyang, Zhou period, Lower-rank elite tombs, Ritual paraphernalia in funeral

ABSTRACT: From August through September 2004, archaeologists excavated two well-preserved elite tombs of the Zhou period at the Wanggudao village in Anyang City. Based on the excavated data,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occupant of tomb No. 2 was the husband while that of tomb No. 1 was the wife. In other words, the owners of the tombs should be a couple belonging to lower rank elites, or *shi* (士), of the Wei state. These two burials should date to either the end of the Western Zhou or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ree objects in the original report were misnamed by the excavators. For instance, the long-thin bronze sheets unearthed from tomb No. 1 should be called *sha* (鬯), which were used as decorations covering the coffin and as ritual paraphernalia symbolizing an elite's status. In addition, the rectangular fish-shaped bronze decorative pendants which were strung and surrounding the coffin of tomb No. 1 indicate the owner's rank might correspond to the class of *shiyichi* (士一池) mentioned in tex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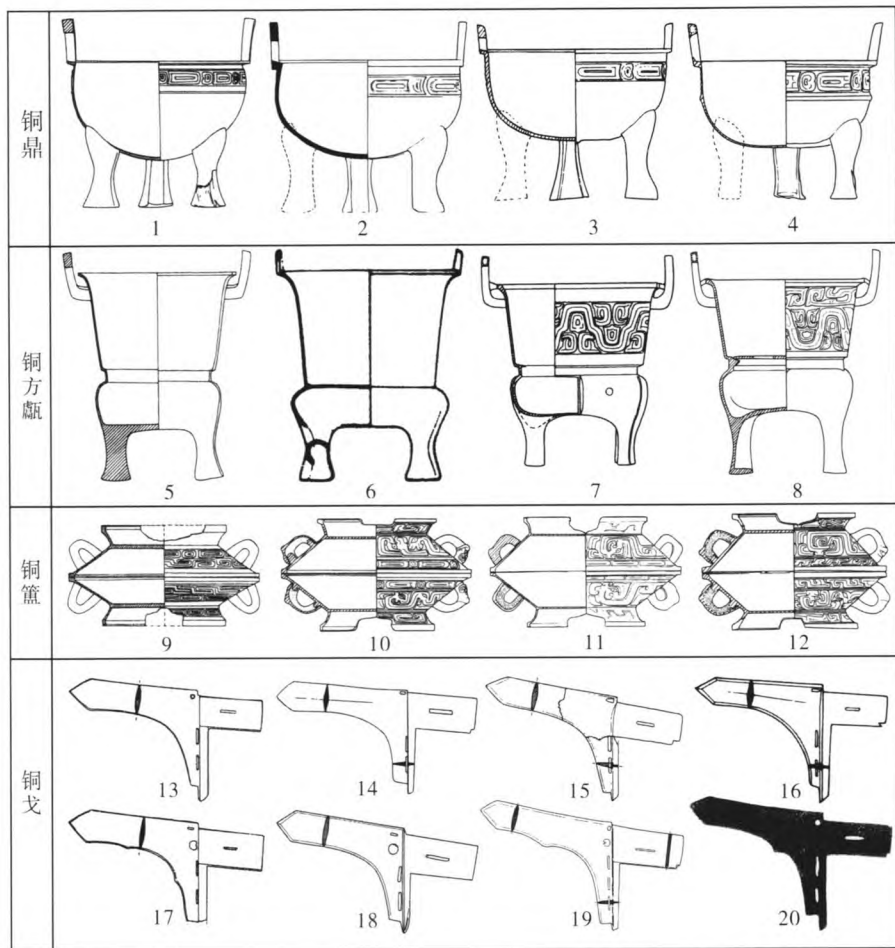
2004年8~9月,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安林高速公路建设工程, 在安阳市王古道村发掘两座保存完好的周代贵族墓葬, 出土了一批青铜器和玉器。发掘者根据随葬器物特征和相关文献记载分析, “这2座墓的主人可能是春秋时期卫国的中小贵族或中下级军事将领”, 并指出“它们的发现, 填补了安阳地区东周考古的一个空白”^[1]。笔者认真拜读了发掘报告, 受益良多, 并顺便记录下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数年过去, 这两座墓似乎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我们现将当初的随笔整理成文, 提出自己的学习心得, 供报告作者及学界诸贤参考。

一、墓葬年代

王古道村两座周代贵族墓除M2出土42枚陶贝外, 未见其他陶器伴出。报告作者根据随葬铜器推断两墓的年代“应属春秋中期, 至迟不过

春秋晚期”。不妥。

礼器方面, M1随葬的礼器组合为鼎1、簋(报告称“双耳罐”)2、方壶2、盘1、匜1, 计7件; M2随葬的礼器组合为鼎2、方甗1、簋(报告称“双耳罐”)2、簠1、方壶2、匜1, 计9件。除M2随葬的鼎、方甗、簠属于实用器外, 其余均为明器。与M1组合相比, M2虽然多出了方甗和簠两类食器, 但却少了水器盘, 组合并不完整, 且属于实用器与明器拼凑而成。鼎、簠、方壶、盘、匜, 这种铜礼器组合形式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 鼎数较多的墓葬通常会在实用器类外再配一组明器, 鼎数较少者则以明器参与其中^[2]。从铜礼器形制看, M2所出铜鼎(M2: 13)与传世的西周厉王时期的攸从鼎、善夫山鼎和宣王时期的函皇父鼎、毛公鼎^[3], 以及考古发掘的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3: 49铜鼎^[4]、三门峡虢国墓地M2001: 130铜鼎、M2011: 87铜鼎^[5]等比较接近, 均作立耳、半球形腹、蹄形足, 口沿下饰一周有珠重环纹



图一 安阳王古道村 M2 与两周之际墓葬出土铜礼器、兵器比较图

1、5、9、13、17. 安阳王古道村 (M2: 13, M2: 7, M2: 15, M2: 19, M2: 20) 2、14. 曲沃北赵晋侯墓 (M93: 49、M93: 138) 3、4、7、8、10~12、15、19、20. 三门峡虢国墓 (M2001: 130、M2011: 87、M2010: 28、M2012: 15、M2012: 14 + 78、M2001: 78、M2017: 6、M2001: 473、SG: 069、M1715: 103) 6、16. 平顶山应国墓 (M1: 56、M1: 36) 18.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 (M28: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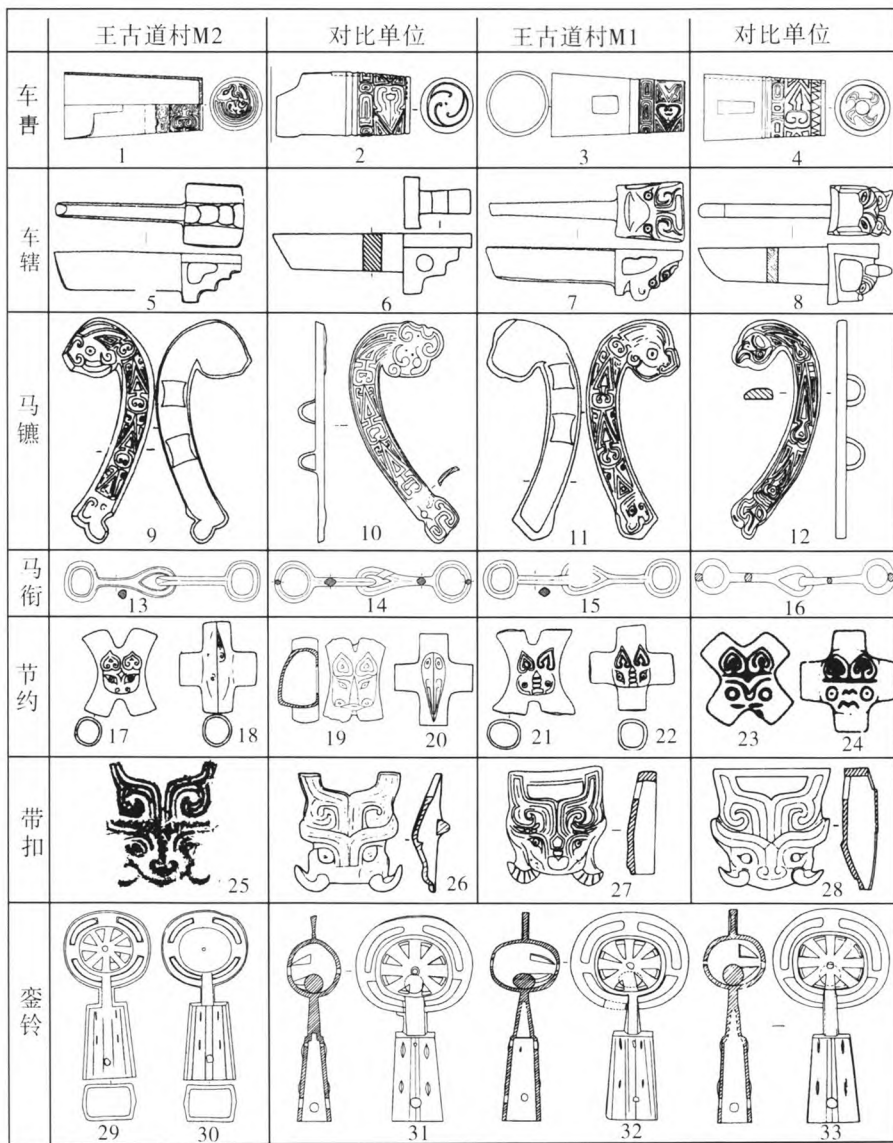
带,腹部中间有一周凸弦纹,下腹素面(图一,1~4)。M2 所出铜方甗(M2: 7)与平顶山应国墓地 M1: 56 铜方甗^[6]相似,将甗、鬲浑铸为一体,甗口外侈作长方形,鬲裆近平,蹄足截面呈 C 形,通体素面,稍有差异的是前者为附耳,后者为立耳,不过,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0^[7]、M2012^[8] 所出铜方甗均为附耳(图一,5~8)。M2 所出铜簠(M2: 15)与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2: 14 + 78 铜簠^[9]相似,均作矩形口,斜直壁,腹部饰一周重环纹和一周曲体龙纹,圈足亦饰一周重环纹,形制相同但纹饰略有差异者在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M2017^[10] 等墓亦有出土(图一,9~12)。明器方面,王古道村 M2 随葬的簠、方壶和匝与 M1 中的同类明器形制基本一致,M1 随葬的鼎、盘与三门

峡虢国墓地 M2012 中的同类明器^[11]大同小异,以上各类明器还见于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93^[12]、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01、M2016、M2017^[13] 和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 M502^[14] 等墓中。

兵器方面,M2 出土的 5 件铜戈均作等腰三角形锋(或称圭首锋),援刃平直,援中脊与内中线基本成一直线,中胡上有两个竖向长方穿,长方形内上有一横向长方穿。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这种锋刃折角明显的所谓“圭首戈”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进入春秋中期,援锋转角趋于圆钝,春秋晚期以后援锋发展成流线形^[1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 件铜戈的援本部增开一近圆形镂孔,孔内有镶嵌物,其中的 2 件援下刃与胡刃上有

波状子刺,这种设计目前还见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16]、三门峡虢国墓地^[17] 出土的铜戈上(图一,13~20)。

车马器方面,M1 随葬有害 1、辖 2、镳 4、衔 2、节约 12、带扣(报告称“当卢”)3、小铜管若干等;M2 随葬有害 6、辖 6、銮铃 2、镳 12、衔 6、节约 21、铜环 2、带扣(报告称“当卢”)2、铜铃 4、马饰 1、小铜管若干等。若以害和辖、镳和衔两相组合,M1 随葬的车马器代表一辆车二匹马的配置,M2 随葬的车马器则代表了三辆车六匹马的配置。从形制上看,车害均作圆筒形,长方形辖孔,有的有豁口,器表饰重环纹、三角形卷云纹、曲体龙纹等,顶面饰卷身夔纹;车辖可分为兽首形、素面阶梯状,辖键为带斜角的扁平条形;銮铃为长



图二 安阳王古道村 M1、M2 与两周之际墓葬出土铜车马器比较图

1、3、5、7、9、11、17、18、21、22、25、27、29、30. 王古道村 (M2: 35-4, M1: 20, M2: 36-1, M1: 14-5, M2: 33-1, M1: 14-1, M2: 33-9, M1: 14-7, M2: 33-5, M2: 33-6, M1: 14-9, M1: 14-11, M2: 3-8, M1: 14-16, M2: 16, M2: 26) 2、6、10、14、19、20、26、28、31、32. 三门峡虢国墓 (M2010: 82, M2010: 81, M2001: 207-1, M2001: 455, M2001: 366-66, M2001: 222-1, M2001: 397, M2001: 292, M2001: 453, M2010: 60) 4、8、12、16. 韩城梁带村芮国墓 (M28: 146, M28: 168, M502: 111-1, M502: 111-2) 23、24、33. 平顶山应国墓 (M1: 84-25, M1: 84-5, M1: 45)

方形釜座,扁球形铃体,正面有8个三角形辐射状镂空,内含铜丸;马镳窄体弯弧,镳首有龙形、环形、圆形等之分;马衔均由双节近8字形的环套接而成;节约均呈双圆管交叉状,有X形、十字形和Y形,正面饰竖耳兽面纹或简化蝉纹;带扣中部隆起,正面呈兽面,头上有丫形双角,顶端双角间或作矮梯形豁口状,或作长条形穿孔,瞋目高鼻阔嘴,嘴角两侧伸出一对向外弯钩的獠牙,

背面相应凹陷,设一细圆柱状或条带状横梁。以上器类和装饰风格普遍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18],在上面提到的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等诸墓葬中均能找到形制相同者(图二)。

综合比较来看,安阳王古道村两座周代贵族墓的下葬年代大致相当,上限当不会早于西周晚期厉宣之世,下限不会晚于春秋早期,具体推定在西周末至春秋初年应是比较稳妥的。

二、墓主身份

根据发掘报告介绍,王古道村 M1、M2 均位于 2004ALGST1 探方内,距离不远,东西并列,没有打破关系。这两座墓的开口深度一致,墓口距地表均为 0.5 米。形制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基本一致,葬具均为一椁一棺,墓底均有长方形腰坑。就具体

测量数据而言,M2 的墓室面积和深度、棺椁尺寸以及腰坑面积,均略大于 M1(表一)。

上文已知,M2 随葬的青铜礼器和车马器均明显多于 M1。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M2 随葬有 5 件铜戈,而 M1 则未见兵器^[19],但 M1 随葬的玉、石器却明显多于 M2。基于文字描述和墓葬平面图观察,M1 出土的玉、石器有 100 余件,主要分布于棺内墓主上身的位置,其中东侧的一

表一 安阳王古道村两座周代贵族墓形制大小比较表

| 墓号 | 墓室 (长×宽-深) | 葬具 (长×宽+高) | 腰坑 (长×宽-深) |
|----|---------------|-------------------------------|----------------|
| M1 | 3.5×2.3-4.8米 | 一椁一棺,椁高1.3米,棺长2.25、宽0.9、高0.8米 | 0.7×0.45-0.35米 |
| M2 | 4.25×2.4-5.7米 | 一椁一棺,椁高1.2米,棺长2.4、宽1、高0.8米 | 0.85×0.4-0.4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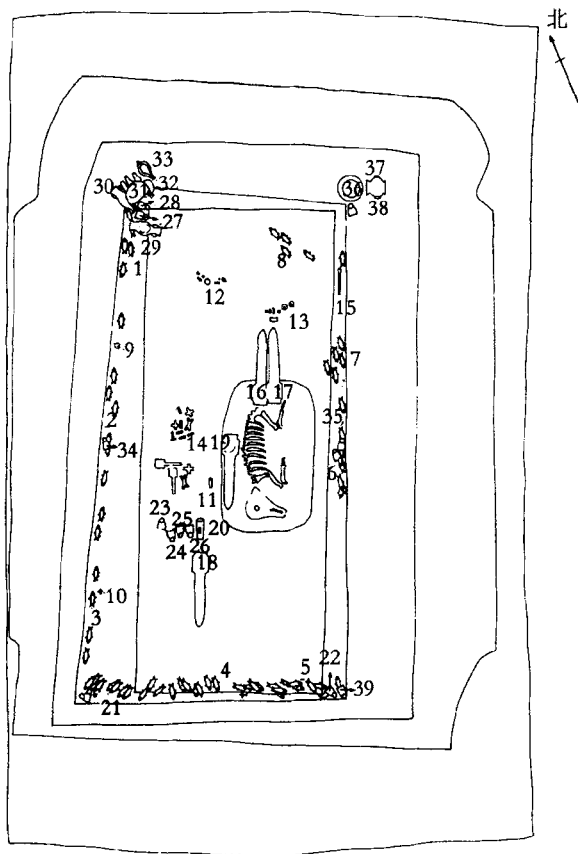
组包括玉玦、虎纹璜形饰、玉蝉、穿孔圆片饰等(编号13),西侧的一组包括玉环、玉牌形饰、珠形饰、贝形饰、扁圆片形饰、管形饰等(编号12),它们大致构成了包括耳饰、项饰和佩饰在内的服饰用玉组合形式,另外该墓东北角棺椁间还放置具有礼仪性质的瑞玉戈(图三)。而M2仅出土了玉环、石戈各1件,不见服饰用玉。通常认为,墓中是否随葬青铜兵器对于判定墓主性别具有一定的指示意义。研究表明,周代女性墓葬使用服饰用玉的数量、概率普遍高于男性墓葬(尤其在下层贵族墓葬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极少数的器类如玉蚕项饰和玉牌联珠串饰则仅见于女性墓葬^[20]。综合以上考古信息,我们有理由推测M2墓主为男性,M1墓主为女性,二者是夫妻异穴合葬墓。

目前学界主要依据墓葬形制(以墓室面积为主)和随葬品组合(以随葬鼎簋数量为主)两种标准来划分周代墓葬等级,继而结合周代相关文献记载,来推测墓主所属社会阶层,大致可以划分为周王(及其夫人)、诸侯和王室重臣(及其夫人)、卿(上大夫及其配偶)、大夫(及其配偶)、士(及其配偶)、庶人及其以下各阶层^[21]。王古道村M2、M1的墓室面积分别为10.2、8.05平方米,随葬鼎簋数量分别为二鼎二簋、一鼎二簋,用鼎数均少于3件。揆诸《仪礼》所载,士兼用三鼎与一鼎之数^[22]。所谓“士”级,或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别^[23]。据此判断,王古道村M2男性墓主的社会身份当属于中士一级,作为其配偶的M1女性墓主的社会身份则稍低一等。

安阳属殷商京畿之地,西周春秋时期属卫国。王古道村两座周代墓墓底均设有腰坑,应为殷商埋葬习俗的延续。它们距离1932~1933年考古发掘的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浚县辛村卫国公室墓地^[24]仅有20余公里,这两座墓的主人应该就是两周之际卫国的“士”级贵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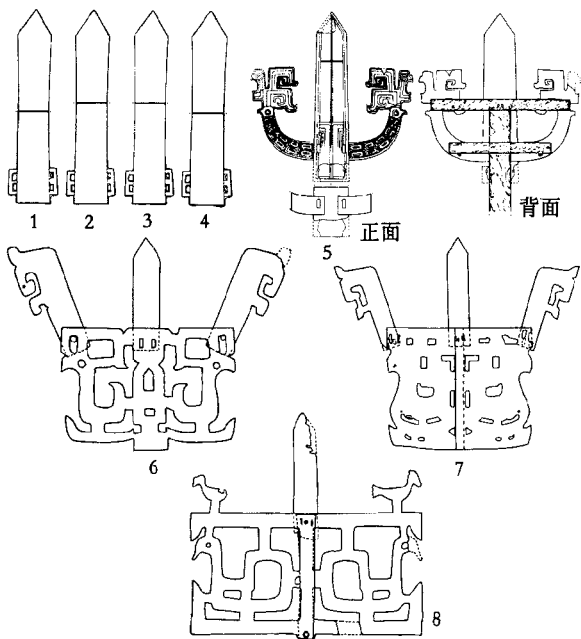
三、圭形铜片——铜翼

考古报告对安阳王古道村周代贵族墓出土器物的定名有误,譬如青铜明器的“簋”被当作“双耳罐”,车马器中“带扣”被称为“当卢”,它们在上文中已被指出,兹不赘述。这里重点讨论M1出土的4件圭形铜片(M1:16~19),报告作



图三 安阳王古道村M1平面图

1. 铜鱼(38件) 2. 铜鱼(35件) 3. 铜鱼(60件) 4. 铜鱼(26件)
5. 铜鱼(46件) 6. 铜鱼(45件) 7. 铜鱼(54件) 8. 铜鱼(49件)
- 9、10. 蚌饰 11. 玉管 12. 玉器(49件) 13. 玉器(53件) 14. 车马器(2套88件) 15. 玉戈 16~19. 铜翼(报告称“铜戈”) 20. 铜车轹
- 21~28、34、35、38、39. 铜铃 29、30. 铜方壶 31. 铜鼎 32. 铜盘 33. 铜匜 36、37. 铜簋(报告正文称“双耳罐”、平面图注为“铜圆壶”)



图四 安阳王古道村 M1 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出土铜鬯比较图
1~4. 安阳王古道村(M1: 16~19) 5~8. 韩城梁带村(M502: 25-1, M18: 2, M51: 2, M17: 3)

者定名为“铜戈”，显然是不正确的。

报告描述它们系明器，形制大小一致，“援为长条形，锋为三角形，直内，内两侧各凸出有两长方形穿。戈上有麻布纹痕迹。长 35 厘米”。从形制上看，它们器身很薄，无“胡”，“援”与“内”无分界，通身较长，目前所知周代考古中从未见到如此造型的铜“戈”。由于“直内”两侧凸出两组对称的长方形穿，使得它们不能像真正的铜戈那样横向纳入木秘，而最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做法当是竖向夹于被劈开的木柄上端，两侧对称穿孔的设计则恰好用以销钉或穿绳将其固定在木柄上(图四, 1~4)。再考察其出土位置，报告文字叙述它们出自 M1“棺上的中部”，墓葬平面图显示标本 M1: 16 和 M1: 17 并列平放于棺上中部略偏东处，圭形首朝北；标本 M1: 18 和 M1: 19 的圭形首均朝南平放，前者位于棺上南部略偏西处，后者位于棺上正中部(图三)。根据 M1 棺外四周散落的铜鱼与铜铃的分布规律，我们可以确定该墓在下葬时应有棺罩(详下)，而这 4 件圭形铜片是被有意识地两组圭首相向平放在棺罩上的，它们身上的“麻布纹痕迹”应系棺罩织物。

基于以上考古信息，我们认为这 4 件圭形铜片应定名为“铜鬯”。

有关“鬯”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俯拾皆是，如《周礼·夏官司马·御仆》：“大丧，持鬯。”《周礼·天官冢宰·女御》：“后之丧，持鬯。”郑玄注：“鬯，棺饰也，持而从柩车。”《礼记·檀弓上》：“周人墙置鬯。”《礼记·礼器》：“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鬯。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鬯。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鬯。此以多为贵也。”《礼记·丧大记》：“饰棺，君龙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锦褚，加伪荒。纁纽六，齐，五采，五贝，黼鬯二，黻鬯二，画鬯二，皆戴圭，鱼跃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画帷，二池，不振容，画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锦褚，纁纽二，玄纽二，齐，三采，三贝，黻鬯二，画鬯二，皆戴纁，鱼跃拂池。大夫戴前纁后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绞，纁纽二，缁纽二，齐，三采，一贝，画鬯二，皆戴纁。”郑玄云：“汉礼，鬯以木为筐，广三尺，高二尺四寸，方两角高，衣以白布。画者，画云气，其余各如其象，柄长五尺，车行人持之而从，既窆，树于圻中。”考古发现的铜鬯最早见于上世纪 50 年代发掘的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25]，后来随着周代考古资料的日益累积，学者们对其研究也不断深入^[26]。归纳以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1. 文献记载的“鬯”是一种用于遮障棺柩的长柄扇形装饰品，同时也是一种标志贵族身份的礼仪丧葬器物。材质有木、竹、羽等，用鬯数量为偶数次序。在将棺柩运往墓地的路上，御仆于柩车两旁持鬯护柩而行以屏路人、障柩车，到了墓地，在将棺柩及其棺罩入葬墓圻之后，随车而行的御仆也要将所持的鬯放入墓内。2. 考古发现的铜鬯可分为上下联体式的山字形和分体缀合式的三叉(齿)形两种形制，高于两侧的中间部分呈圭形，铜鬯的木质衬托和下方所装的木柄往往腐朽难辨。随葬铜鬯的墓葬年代似不早于西周中晚期之际，主要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之后便逐渐衰退。随葬数量既有 4、6、8 件的偶数，也有 3、5 件的奇数，置鬯多寡虽有标志墓主身份高低的等级意义，但具体对应并非特别严格，不像文献记载的那样绝对。

以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7]为例，铜鬯是出土频率高、数量多的一类器物，在已发掘的 30 余座墓中，5 座带墓道的大墓和 8 座中型墓中的 5

座均有发现,除带双墓道的 M27 出土 8 件外,其他大中型墓均为 4 件,且有两两成组的特点。它们一般被放置在棺盖之上或其他较高处,所以往往在清理了椁顶棚木遗迹后最先被看到。各墓出土铜鬯的形制虽有差异,但中间有一圭形铜片,两侧有对称饰件而呈三叉(齿)状的整体特征还是比较一致的(图四,5~8)。比较来看,王古道村 M1 所出的 4 件铜鬯也两两成组,形制应属于分体缀合式的三叉(齿)形,其复原安装方式当如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所出铜鬯那样,圭形铜片竖向置于有柄的木(竹)框上,用下端的对称穿孔销钉或穿绳加以固定。只不过两侧的对称饰件和下方依托的框体可能因系有机材质已完全腐朽,所以只剩下了中间的圭形铜片部分,也就是《礼记·丧大记》所说的鬯之“戴圭”。

四、饰棺用器——以铜鱼为核心

王古道村 M1 出土 353 件铜鱼和 13 件铜铃,报告作者根据出土位置判断,“这些小铜鱼和小铜铃串在一起,系于棺外帷帐的四周,起装饰作用”。细致观察该墓葬平面图(图三),可知这些铜鱼比较均匀地分布在棺外四周,其中西侧和南侧的分布状况基本呈直角边;21 号和 38 号铜铃分别位于棺外西南和东北角,22、39 号两件和 27、28 号两件铜铃分别位于棺外东南和西北角,34 号和 35 号铜铃分别位于棺外中部的东西两侧,它们成组对称分布,原本是与铜鱼串联在一起的;至于 23~26 号铜铃与车马器聚集在墓室中部偏西南处,应归入车马器类。此外,位于棺外西侧的 9、10 号蚌饰与铜鱼呈直线分布,原本也应是串联在一起的饰物。如此看来,王古道村 M1 的饰棺串饰是由铜鱼、铜铃和蚌饰构成的,而 M2 则不见这种饰棺之物。已有研究表明,以铜鱼为核心,辅以铜铃、蚌、贝等的饰棺串饰组合形式流行于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主要为中下层贵族所使用,与同等级的男性相比,女性的饰棺串饰在对铜鱼的选择上有更强的“偏爱”^[28]。基于这一角度,上文我们对王古道村两墓年代与墓主身份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根据文献所载周代丧葬礼制,棺柩由殡地运赴墓圻下葬时要进行装饰,上文所引《礼记·丧

大记》谓之“饰棺”,饰棺之物主要包括褚、荒帷、池、振容等。所谓“褚”,是直接覆盖在棺上的罩布;“荒帷”是缝缀在类似房屋形的木构框架上的布帛,蒙在上面的称为“荒”,围于四周的称为“帷”,亦可统称为“墙柳”;“荒”上有“池”,以竹为帘,外覆青布,池下悬铜鱼,系振容^[29]。郑玄曰:“君、大夫以铜为鱼,悬于池下。揄翟,青质五色,画之于绞缙而垂之,以为振容,象水草之动摇,行则鱼上拂池。”^[30]有学者认为,周代饰棺的设置乃是对死者生前居室形式的模仿,鱼和水草等水中生物装饰在房屋上,有防火之寓意,把铜鱼与象征水草的振容一起悬于棺罩池下,即是遵循“事死如事生”丧葬习俗的生动写照^[31]。另一方面,饰棺的目的还在于不让他人送葬的路途及墓圻中直接看见亲人棺柩而产生厌恶感,即如郑玄注云:“饰棺者,以华道路及圻中,不欲众恶其亲也。”由于饰棺之物主要为木构、布帛之类的有机质料,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在周代贵族墓中很难发现它们的整体架构,只能从散落的铜鱼等“池”下饰物以及残存的“荒帷”印痕等来窥得一二。

《礼记·丧大记》有所谓“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的说法,表明不同社会身份的墓主在使用饰棺方面有着等级差别。若将王古道村 M1 发现的铜鱼以平行直线相连,大致构成了长方形,在四角与东西两侧的中间有 1 或 2 件铜铃,西侧还等距排列有 2 枚蚌饰。与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发现的“目”、“日”字形饰棺串饰形状^[32]相比,王古道村 M1 的长方形饰棺串饰只构成一个单元,可能即是“士一池”之象。

[1] 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安阳市王古道村东周墓葬发掘报告[J]. 华夏考古, 2008(1).

[2]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1559-1573.

[3] 朱凤瀚. 中国青铜器综论(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1320,1325.

[4]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J]. 文物, 1995(7).

[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9:39,327.

型。下肢骨的研究表明成年男性拥有非常扁平的股骨上端和中等扁平的胫骨。古病理观察只发现一颗龋齿,根据食谱分析,木柱柱梁居民食物结构中以植物性食物为大宗,植物性食物易造成龋齿,但在时代和距离都较近的石峁内城居民牙齿上也没有发现龋齿,同样值得关注。

- [1] 邵象清. 人体测量手册[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 [2] 潘其风,韩康信. 柳湾墓地的人骨研究[C]//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261-303.
- [3] 转引自李法军. 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 [4] 朱泓. 游遗址夏代居民的人类学特征[C]//忻州游遗址.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8-214.
- [5] 李法军. 河北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上接 49 页)

-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管会. 平顶山市北澧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88(1).
- [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 三门峡虢国墓地 M2010 的清理[J]. 文物,2000(12).
- [8] 同[5]:249.
- [9] 同[5]:252.
- [10] 同[5]:57,393.
- [11] 同[5]:248,251,258.
- [12] 同[4].
- [13] 同[5]:51,66,391,394.
-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景区管理委员会. 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18-19.
- [15] 井中伟. 早期中国青铜戈·戟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100,125.
- [16] 同[14]:117.
- [17]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图版贰拾. b. 同[5]:84,488. c. 同[7].
- [18] 吴晓筠. 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C]//古代文明(第1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80-277.
- [19] 报告作者将该墓出土的4件圭形铜器归入兵器戈类是错误的.
- [20] 孙庆伟. 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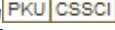
- [6] 朱泓. 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新石器时代颅骨的人类学特征[J]. 人类学学报,1994(2):126-133.
- [7] 方启. 陕西神木寨崾遗址古人骨研究. 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6-336.
- [8] 严文明.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有关问题[C]//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论集.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3-12.
- [9] K. Pearson. Karl and Bell. Julia. 《A study of the long bones of the English skelet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17. 转引自张君:河南商丘潘庙古代人骨种系研究,考古求知集-96 考古研究所中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486-498页.
- [10] 刘武. 蒙古人种及现代中国人的起源与演化[J]. 人类学学报,1997(2):55-73.
- [11] Weidenreich F.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 primitive hominid skull》, Palaeontologia Sinica Series N S D.

(责任编辑 张鹏程)

- [21] a. 俞伟超,高明. 周代用鼎制度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1,2). 1979(1). b. 同[20]:6.
- [22] 张闻捷. 周代用鼎制度疏证[J]. 考古学报,2012(2).
- [23]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309.
- [24] a. 郭宝钧. 濬县辛村[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4. b. 李学勤. 东周与秦代文明(增订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70. c. 同[3]:1334-1340.
-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 [26] a. 孙华. 中山王墓铜器四题[J]. 文物春秋,2003(1). b. 王龙正,倪爱武,张方涛. 周代丧葬礼器铜器考[J]. 考古,2006(9). c. 同[14]:221-223.
- [27] 同[14]:221-223.
- [28] 王洋. 周代饰棺申饰研究[C]//周原(第1辑). 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127-142.
- [29] 张长寿. 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洋西发掘资料之五[J]. 文物,1992(4).
- [30] 孙希旦. 礼记集解(下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184-1187.
- [31] 孙华. 悬鱼与振容[J].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1).
- [32] 同[14]:223-224.

(责任编辑 李自智)

安阳王古道村周代贵族墓四题

作者: [井中伟, 和菲菲](#)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刊名: [考古与文物](#) 
英文刊名: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年, 卷(期): 2015(5)

引用本文格式: [井中伟, 和菲菲](#) [安阳王古道村周代贵族墓四题](#)[期刊论文]-[考古与文物](#) 2015(5)